

# 前言

——陳旭麓、沈渭濱先生與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張 劍

1938年春夏之交，蔣廷黻在武漢偷閑撰寫《中國近代史》時，20歲的陳旭麓先生（1918—1988）正就讀於內遷貴陽的大夏大學，而淪陷區上海古鎮七寶的沈渭濱先生（1937—2015）正牙牙學語，還不到一周歲。幾十年後，他們因緣緊密聯繫在一起，蔣廷黻因陳旭麓、沈渭濱先生師徒的推介而在大陸學界走紅，其《中國近代史》一書成為出版界寵兒。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學科奠基人

蔣廷黻無疑是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創者與奠基人。1935年6月，中央研究院首屆評議會選舉成立時，蔣廷黻以「現任清華歷史系主任，專研清代外交史，著有論文數十篇」，與朱希祖、胡適、陳寅恪、陳垣、顧頡剛候選歷史學科聘任評議員。選舉中與顧頡剛僅各得一票，落敗於胡適、陳垣、陳寅恪。1940年第二屆評議員選舉時，已棄學從政的蔣廷黻還是被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舉為候選人，候選理由為「對於近代史頗有研究」。同被傅斯年推舉者除朱希祖、顧頡剛外，還有張爾田、湯用彤、金毓黻。在大學教授們的初選環節，蔣廷黻與金毓黻都獲得合格票數，但排名居於陳寅恪、胡適、陳垣、顧頡剛、湯用彤、朱希祖之後，未能成為正式候選人。

自 1935 年棄學從政後，蔣廷黻一直在政壇摸爬滾打，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從事專業學術研究，離開學術界愈來愈遠。但在十餘年後的 1948 年首屆中研院院士選舉中，學術界並沒有忘記他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奠基作用。還是傅斯年，與胡適討論文史組歷史學科候選人時，將蔣廷黻與陳垣、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余嘉錫、柳詒徵並舉，並稱蔣廷黻「近代史尚無第二人」。最終蔣廷黻被武漢大學和中研院同時推舉為候選人，經評議員審定，與李劍農、柳詒徵、徐中舒、徐炳昶、陳垣、陳寅恪、陳受頤、傅斯年、顧頡剛成為歷史學科的正式候選人，候選理由為「主持大學史學系多年，專治近代中國外交史」。最終選舉中落選，未能成為首屆中研院院士。

可見，自 1935 年首屆中研院評議員選舉以來，蔣廷黻一直作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唯一代表，與其他史學大師在學術評議的舞台上互爭雄長，但終因自身在學術研究上成就並不突出、中國近代史學科發展不完備等多種因素，未能為中國近代史學科在中研院爭得一席之地。直到 1958 年 4 月，僻居台灣的中研院舉行第二次院士選舉，蔣廷黻才如願以償與姚從吾、勞榦等當選歷史學科院士，仍然是中國近代史學科首位院士。

## 陳旭麓先生發掘《中國近代史》

《中國近代史》1938 年 7 月出版，翌年又相繼推出兩個版本，可見其受歡迎程度。1949 年後，「因人廢事」也「因人廢書」，相當長時間內蔣廷黻及其書在大陸不是作為被批判的對象如吳文燦《批判蔣廷黻的反動歷史觀點對於中國近代史的歪曲和污蔑》、金應熙《批判洋奴買辦蔣廷黻的反動史學觀點》，就是長時間成為禁忌而被遺忘。直到 1987 年，在陳旭麓先生極力推薦下，《中國近代史》作為「舊籍新刊」叢書，由嶽麓書社出版。陳先生在《重印前言》中專門提及這一經過：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我到長沙參加左宗棠逝世百周年紀念的學術討論，訪問了嶽麓書社，鍾叔河同志談起他們「舊籍新刊」的計劃。這裏的「舊籍」一詞，大體指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年間刊行的一些書，是介於古籍與新書之間的著述。

我順便提到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嗣後，鍾叔河同志來信要我為「新刊」此書寫幾句話。

當時改革開放不久，畢竟有禁忌。雖然陳先生說，「存其文而原其人」，除個別詞句外對原書「不加改削」，但「最後一節，講的是『抗戰建國』的現實，不免囿於成見，就把它節略了」。並附蔣廷黻代表性著述《評〈清史稿·邦交志〉》等三種，以《中國近代史·外三種》刊行。

陳先生發掘《中國近代史》後，蔣廷黻在大陸似乎也就不再是禁忌了。自 1988 年劉耀發表《蔣廷黻的文化史觀與中國近代史》開始，不斷有學者將他作為研究對象，如嚴君《蔣廷黻生平事略》、任駿《蔣廷黻與七七事變前後的中蘇關係》等，也陸續公佈了《蔣廷黻關於蘇聯概況、外交政策及中蘇關係問題致外交部報告》《駐蘇大使蔣廷黻與蘇聯外交官員會談紀錄》等相關史料。

窗戶紙被捅破後，《中國近代史》也開始出現新版本。1994 年 8 月，海南出版社在「人人袖珍文庫」第一輯推出新版，將最後一節「蔣總裁貫徹總理的遺教」改為「貫徹總理的遺教」（此成為以後大陸大多數版本共同遵循的模式），另附《評〈清史稿·邦交志〉》等兩文，1997 年 6 月已第 3 次印刷。1996 年 3 月，東方出版社「民國學術經典文庫」，以青年書店 1939 年版為底本重版，書名為《中國近代史大綱》。

相對蔣廷黻在民國學術界的地位和政界特別是外交界的影響，他對中國近代史學科的奠基作用及《中國近代史》的特出地位，上述研究與出版僅僅開啟大幕而已。1999 年，陳旭麓先生的學生沈渭濱先生相繼發表論文《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和出版由他「導讀」的《中國近代史》後，蔣廷黻及其《中國近代史》成為學術界研究熱點和出版界寵兒，形成長時間不衰的「蔣廷黻熱」。

## 沈渭濱先生「導讀」與蔣廷黻研究熱

大致在 1999 年春節前後，已從復旦大學歷史系退休的沈先生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谷玉女士邀請，為入選出版社「蓬萊閣叢書」的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撰寫「導讀」。與一般「導讀」僅僅集中於作品本身不同，沈先生在顧衛民教授

的幫助下，竭力搜羅台灣出版的各種蔣廷黻資料，從「知人論世」出發，費心費力集中於「蔣廷黻其人」的研判與撰寫，然後分析其書的學術價值與學術影響，並從中國近代史通史體系的發展和變化角度，將同為中國近代史通史性質的蔣廷黻書與陳旭麓先生《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打通，討論蔣廷黻書在中國近代史通史體系的學術地位。最終，沈先生的「導讀」篇幅近 5 萬字，與蔣廷黻書體量幾乎相當，成為閱讀與理解蔣廷黻的典範之作。馬勇先生以為，這篇「導讀」是沈先生討論近代史宏大問題的代表作，「論其人，導其書，進而討論中國近代通史研究、寫作的推陳出新」。

沈先生論文發表和「導讀」出版後，蔣廷黻一下子成為學界關注熱點，粗略統計「中國知網」收錄篇目，到 2019 年 20 年間各類文章超過 130 篇。以蔣廷黻為論題的碩士論文 5 篇，涉及他的史學思想與實踐、現代化思想、教育救國思想、《獨立評論》時期的「新式」專制思想等；以他為中心研究清華大學歷史系的發展、中國自由主義的碩士論文 2 篇；以他為題的博士論文 2 篇，即復旦大學王春龍《蔣廷黻與善後救濟》和浙江大學傅敏《1961 年台灣圍繞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交涉之研究——以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為中心》。

上述各類文章，專門討論《中國近代史》一書近 20 篇，涉及該書的史學特徵、史學思想與學術影響，與當時社會思潮的關係，版本流變及勘誤等，在沈先生研究基礎上全方位分析了《中國近代史》的方方面面。在眾多的研究成果與研究群體中，不同的研究者也逐步形成其研究重心與研究特色，如劉超對以蔣廷黻為中心的清華學人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蔣廷黻的史學傳承等進行了梳理與剖析；蔡樂蘇對蔣廷黻的外交思想、現代化思想、學術思想等進行了分析；陳紅民及弟子傅敏突破以往束縛於民國時期的侷限，以哈佛燕京圖書館所藏「蔣廷黻資料」為基礎，對蔣廷黻在政權鼎革後政治與外交活動等進行了考察研究，並影印出版了《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蔣廷黻資料》24 冊。張玉龍在長期的研究基礎上，出版了第一部蔣廷黻研究專著《蔣廷黻社會政治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6 月），認為蔣廷黻起家於學術，兼跨行政、外交等領域，文治事功均殊於時俗，通過對蔣廷黻社會政治思想和實踐研究，展現了民國社會變遷的艱難曲折，透視了具有多重身份和多樣性格的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時空環境進行自我調適的諸種心態，有助於考察民國時期專家政治實踐。隨着美國印第安那德堡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江勇振《蔣廷黻：從史學家到聯合

國席次保衛戰的外交官》（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21 年 2 月）的出版，蔣廷黻研究進入了新階段。

##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出版熱

與學術界立馬興起的研究熱相比，出版界對《中國近代史》的反應似乎慢半拍。直到 2006 年 1 月，團結出版社才以「民國珍本叢刊」為名再版此書，附錄《評〈清史稿·邦交志〉》和《琦善與鴉片戰爭》。當年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世紀人文系列叢書」、江蘇教育出版社「國學書庫」推出新版。

六年之後的 2012 年 6 月，武漢出版社再版《中國近代史》，並譽為「最有份量的中國近代史」。2014 年 1 月，江蘇人民出版社以「含章文庫」推出「精裝典藏無刪節本」，並附錄《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等 4 種。當然，這個「無刪節本」最後一節標題還是沒有「蔣總裁」。同年 3 月，新世界出版社插圖珍藏版，與江蘇人民版相比，附錄少兩種。

2015 年蔣廷黻去世 50 周年，《中國近代史》成為公版書，各種版本井噴出現。7 月，群言出版社推出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授權版，並以《中國與近代世界》為名輯錄《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等 12 篇文章。12 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在「民國經典文庫」下推出其版本。翌年 1 月，先後有中國文史出版社（民國名家史學典藏文庫）、雲南出版社（民國學術文化名著叢書）、民主與建設出版社、中國華僑出版社等扎堆出版各自版本。3 月，又有北京聯合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團、北京中華書局等出版新版本。此後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中國法制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等二十家左右出版社相繼加入戰團，或推出插圖本、彩圖增訂本、插圖珍藏版，或名之曰「國民閱讀經典」等等，不一而足。

在各種單行本外，還有一些套裝。2007 年，陝西某社將《中國近代史》與張蔭麟、呂思勉的通史著作合編為《中國史綱》出版，並以錢穆的《閱盡滄桑，讀史明智》為代序，可謂「奇葩」。2014 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將《中國近代史》與雷海宗《國史綱要》集結為「權威國史讀本套裝」典藏全 2 冊出版。2017 年文津出版社，將《中國近代史》與李大釗、張蔭麟、何茲全、呂思勉等人著作合集為《跟大家讀中國史》共 10 冊，在「詩書傳家書系」名義下出版。當然，還

# 目錄

有其他合集版本，這裏就不贅說。

沈渭濱先生導讀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出版後，2001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到 2012 年 4 月已第 8 次印刷。另外，上海古籍社曾授權香港三聯書店「大師小作」叢書 2001 年出版該版。2004 年 7 月上海古籍社出版《插圖本中國近代史》，導讀之外，沈先生還撰寫了簡短的前言。2014 年 10 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曾以《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導讀》推出沈先生生前最為滿意的精裝本。近從網絡獲悉，上海古籍社又於 2019 年 3 月推出沈先生導讀的「蓬萊閣典藏系列」《中國近代史》。可見，因有「詳細的導讀」使該版本成為蔣廷黻《中國近代史》眾多版本中的權威與經典版本。

值得指出的是，2016 年 1 月北京某社版前有「寫在前面的話」，完全抄襲沈渭濱先生為上海古籍社《插圖本中國近代史》所寫「前言」，「附錄」中《蔣廷黻這個人》，分「農家小子蛻變成的洋博士」「一個影響巨大的新潮史學家」「創辦《獨立評論》與棄學從政」三個部分，抄襲與洗稿一目了然。

蔣廷黻及其《中國近代史》在大陸的沉浮，從一個側面顯現了幾十年來大陸社會政治文化的變動。蔣廷黻成為學術界研究熱點，自然與蔣廷黻在近代中國的學術地位、棄學從政知識份子典型意義及其在外交事業上的作為密切相關，《中國近代史》成為出版界寵兒，也與該書的簡明扼要、近代化史觀切合了中華民族復興的社會與文化需求有關，但不得不承認，蔣廷黻及其書在大陸的時興與陳旭麓、沈渭濱先生師徒倆的極力推介與推崇相關。馬勇先生曾在紀念沈渭濱先生的文章說，沈渭濱先生接續陳旭麓先生，「對蔣廷黻及其近代史給予極高評價。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過去二十年中國近代史學界推崇蔣廷黻以及現代化研究模式，陳旭麓先生、沈渭濱先生是最重要的兩位推手，學術界從他們兩位那裏獲得了不少啟示」。（馬勇《沈渭濱先生對近代史幾個問題的見解》，《文匯報·文匯學人》，2015 年 5 月 22 日）

## 導讀

一、蔣廷黻其人	003
二、蔣廷黻其書	020
三、近代通史體系的推陳出新	030

## 中國近代史

### 總論

### 第一章 剿夷與撫夷

第一節 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056
第二節 英國人作鴉片買賣	060
第三節 東西對打	062
第四節 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067
第五節 不平等條約開始	070
第六節 剿夷派又抬頭	073
第七節 剿夷派崩潰	077

### 第二章 洪秀全與曾國藩

第一節 舊社會走循環套	084
第二節 洪秀全企圖建新朝	087
第三節 曾國藩刷新舊社會	091
第四節 洪秀全失敗	094

# 《中國近代史》 導讀

——兼論近代通史體系的推陳出新

沈渭濱

## 第三章 自強及其失敗

第一節 內外合作以求自強	100
第二節 步步向前進	104
第三節 前進遇着阻礙	108
第四節 士大夫輕舉妄動	114
第五節 中日初次決戰	124

##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復興

第一節 李鴻章引狼入室	136
第二節 康有為輔助光緒變法	139
第三節 頑固勢力總動員	142
第四節 孫總理提民族復興方案	151
第五節 民族掃除復興的障礙	156
第六節 軍閥割據十五年	164
第七節 蔣總裁貫徹總理的遺教	169

## 附編

---

一、中國近代化的問題	176
二、李鴻章——三十年後的評論	180
三、外交與輿論	187
四、帝國主義與常識	190
五、革命與專制	194
六、知識階級與政治	199
七、漫談知識份子的時代使命	204
八、介紹與批評《族國主義論叢》	208
九、現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觀	211

---



現在的青年人，對蔣廷黻這個名字，恐怕大多數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國成立前，無論在學界還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學界，他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先後做過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以主張史學改革著稱於時；在政界，他是著名的外交家，先後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駐蘇聯大使、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49年後又一度作為台灣當局「駐美大使」。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聞名於世。

作為政治家，他是當時「書生從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張以所學為國家所用。在國共兩黨鬥爭中，儘管站在國民黨政府立場，並在聯合國中阻撓和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願加入國民黨，還經常批評當局的政略失當和政治腐敗；作為學者，他是當時公認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專家和這一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他從治外交史擴及中國近代史，寫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專題論文。他一生治學嚴謹，著作不多。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極大精力輯錄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sup>1</sup>，而是這本僅五萬餘字的《中國近代史》。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不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領域中的學術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響的學人，在思考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社會進步時的普遍心態而受世人矚目。

蔣廷黻有過長期的從政經歷，他的歷史觀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傾向影響。所以這本著作在共和國成立後曾多遭非議。但是，學術與政治畢竟是兩回事。誠如陳旭麓師在此書被湖南嶽麓書社輯入「舊籍新刊」時寫的《重印前言》裏所說：重印的宗旨在於「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場而抹殺其學術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塗改前人的文字」<sup>2</sup>。現在，「存其文」已經做到，「原其人」則有待努力。考慮到大家對蔣廷黻知之不多，這篇「導讀」就多寫點蔣廷黻其人；進而論蔣廷黻其書的學術價值和學術影響，以有助於大家「知人論世」；第三部分，從近代通史體系的發展變化角度，進一步說明蔣廷黻著《中國近代史》的學術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現狀，以加深對蔣廷黻學術成就的理解。

## 一、蔣廷黻其人

### 1 留美洋博士

蔣廷黻，湖南寶慶（今邵陽）人。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出生於一戶薄有田產的農家。1965年病逝於紐約，享年70歲。

蔣家從他的祖父時代起，就務農兼經商，在靖港開了一家經營鐵器的店鋪，由他的父親和二伯父輪流看管<sup>3</sup>。祖父死後，留下一個店鋪和12畝田地。三個兒子連同老娘各分得三畝，店鋪則由三兄弟各佔一份<sup>4</sup>。由於他的大伯父是個抽鴉片的癮君子<sup>5</sup>，所以靖港的店鋪仍由他的父親和二伯父輪流掌管。

蔣廷黻說他的父親「很有經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間領袖」，晚年做過靖港的商會會長，在家鄉常為鄰居「排難解紛」<sup>6</sup>。但對蔣廷黻早年人生歷程影響更大的，則是他的二伯父。如果沒有二伯父決心要他「努力讀書，求取功名」，那麼他早已被父親弄到店裏去當學徒了<sup>7</sup>。

蔣廷黻的母親姓熊，外祖父是個窮秀才。母親在他6歲時患病去世。不久，父親續弦。據蔣廷黻說，繼母對他和哥哥「照顧的無微不至」，是位好主婦、好母親<sup>8</sup>。他幼年失恃，父親又常年在外，有個好繼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1

蔣廷黻先生



蔣廷黻 4 歲發蒙，由私人教師教讀<sup>9</sup>。6 歲起入私塾接受舊式教育。10 歲那年，即 1905 年（光緒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舉取仕制度。二伯父決定讓姪子進新式學堂<sup>10</sup>。1906 年初，11 歲的蔣廷黻到省城長沙明德小學讀書，一學期後，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國長老會在湘潭辦的教會學校益智學堂，開始接觸新學，學習英文。1911 年（宣統三年），因辛亥革命爆發，益智停辦而輟學。最後一學年，他接受洗禮，成了一名基督徒<sup>11</sup>。

在教會學校那幾年，正是晚清政局動蕩、新潮勃發的年代。湖南雖屬內地，卻頗得風氣之先。立憲請願、收回利權、新政辦學、派遣留學生，都搞得轟轟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也通過新式書報不脛而走<sup>12</sup>。蔣廷黻身處其間，又在美國人辦的學堂裏讀書，耳聞目染，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學的打算。1912 年，他在徵得益智學堂校長太太，也是他的英文、歷史教師林格爾夫人同意之後<sup>13</sup>，湊了點錢，就隻身到美國去了<sup>14</sup>。這一年他 17 歲。

到美國後，因為帶的錢不多，便進了密蘇里的一所半工半讀的派克學堂（Park Academy, Parkville, Missouri）讀中學。1913 年，獲得湖南省官費。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學堂，兄弟倆仍靠半工半讀維持。1914 年蔣廷黻中學畢業。將近三年的半工半讀生涯，不僅使他鍛煉了意志和強壯了身體<sup>15</sup>，而且使初到美國的他，對美國人民在他大病時所給予的真誠關懷終生難忘<sup>16</sup>。

1914—1918 年，蔣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 Oberlin, Ohio）度過了他在的大學時代。蔣廷黻在大學裏主修歷史學，同時也選讀多門自然科學課程<sup>17</sup>。當時，他已對祖國國內的軍閥紛爭和混戰所引起的各種問題產生了探究慾，希望通過歷史課的學習，獲得「將來在中國從事政治工作」的知識和經驗<sup>18</sup>。由於歷史系的教學枯燥乏味、課程內容無法滿足他的需求，他在課外閱讀了許多德國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對俾斯麥、加富爾、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sup>19</sup>。這對他日後希望中國擺脫中世紀狀態，努力建設成一個民族國家的社會政治史觀的確立，有重要影響。

大學時代，蔣廷黻接受了嚴格的科學方法訓練。自然學科的教授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教科書的條文，要他們學會觀察事實；研究報告一定要做到觀察仔細，結論客觀<sup>20</sup>。這種訓練使他終身受用。後來他從事歷史研究時，堅持從史料中得出結論，憑史料說話；從政後，也極重視實際觀察，不少問題表現了獨立識見。

歐柏林學院的宗教氣氛十分濃重。蔣廷黻雖然是個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國留學生一樣，對美國教會醜化中國人十分反感<sup>21</sup>。基於民族自尊的愛國情感，使他「對整個教會活動感到懷疑」，甚至認為傳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sup>22</sup>。所以，在整個大學時代乃至日後的行動中，他只把信仰作為一種精神慰藉，並不執着於宗教教義的追求和宗教儀式上的頂禮膜拜。他堅信「中國不會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sup>23</sup>，只有科學技術才能救中國。因此，他在中國留學生中，力主用科學技術為祖國服務的觀點<sup>24</sup>。

蔣廷黻的大學時代，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始終。戰爭期間，他的立場是「親西方」的。他站在協約國一邊，對美國威爾遜總統關於戰後國際關係中民族自決、國無大小強弱一律平等、戰勝國不要求割地賠款等的十四點宣言，十分讚賞。他說「威爾遜總統所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信以為真」<sup>25</sup>。直到後來「巴黎和會」議決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時，他在吃驚之餘，對威爾遜有了懷疑<sup>26</sup>。不過，他懷疑威爾遜而不懷疑美國政府<sup>27</sup>，他的親西方傾向並不因威爾遜背叛諾言而破解。

1918 年蔣廷黻大學畢業，獲文學士學位。畢業後，他立即應基督教青年會徵召，到法國去為在法軍中服役的大批華工服務<sup>28</sup>。期間，還經常與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保持接觸，「分擔他們的憂慮和失望」，思考代表團拒絕和約將對國內學運、政情產生的影響<sup>29</sup>。他的親西方傾向沒有泯滅他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關懷。

1919 年夏季，蔣廷黻從巴黎重返美國，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

進哥大之初，他想做個能左右中國政壇的新聞界大亨，所以進了新聞學院。不久，覺得要左右政壇必須懂得政治，便進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學。最後，認為政治學科所講的政治只是理論而非實際的，「欲想獲得真正的政治知識只有從歷史方面下手」，於是又轉為專攻歷史，主修歷史學<sup>30</sup>，師從著名的政治社會史教授卡爾頓·海斯（Carlton J. H. Hayes）。

海斯是美國「新史學」倡導者詹姆斯·魯濱遜（James H. Robinson）<sup>31</sup>的弟子，而哥倫比亞大學正是美國「新史學」派的中心。魯濱遜在哥大執教長達 25 年，弟子及再傳弟子遍佈美國各個大學。其中如畢爾德、紹特威爾、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 20 世紀上半葉美國史學界的知名人物。這個